

天上大乱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时迁/译

1

据称，中国有句古老的诅咒（与中国无关——可能是某个西方观察家发明的）说：“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①（*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有趣的时代指的其实是烦恼、困惑和痛苦的时代。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我们似乎最近看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毛泽东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这里的意思：当现有的社会秩序正在瓦解时，随之而来的混乱为革命力量提供了果断行动和掌握政治权力的绝佳机会。今天，天底下当然有很大的混乱，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全球变暖、新冷战的迹象，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民众抗议和社会对立，这些只是困扰我们的几个危机。但是，这种混乱是否仍然使情况变得很好，还是让自我毁灭的危险太高？毛泽东心目中的情况与我们自己的情况之间的区别，可以通过一个微小的术语区分来最好地呈现。毛泽东谈到了混乱的天“下”，其中“天”或任何形式的大他者——历史进程的不可阻挡的逻辑、社会发展的规律——仍然存在并谨慎地调节着社会混乱。今天，我们应该谈论天本身是混乱的。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

在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经典民主德国小说《分裂的天堂》（1963年）中，关于分裂的德国的主观影响，曼弗雷德（他选择了西方）对他的爱人丽塔说，当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但即使我们的土地被分割，我们仍然共享同一个天堂”。丽塔（选择留在东方）痛苦地回答说。“不，他们首先分割了天堂。”这部小说提供了正确的见解，即我们“尘世”的分裂和争斗最终总是建立在“分裂的天堂”之上；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居住的（象征性的）宇宙中，存在着更为激进和排他的分裂。今天的情况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天堂被分为两个领域，两个全球世界观相互对峙。今天，天堂的分割似乎越来越多地在每个特定的国家内划定。在美国，民粹主义的另类右派和自由民主的建制派之间存在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战。在欧洲，新冠病毒否认者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众运动……共同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小，反映了正在进行的物理公共空间的封闭，这发生在一个多重交叉的危机意味着比以往更需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的时候。是什么阻碍了全球的团结与合作？

^①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反讽，其中“有趣的时代”（*interesting times*）暗示着“动荡和纷乱”，带给普通人的可能是痛苦。实际上“无趣的（*uninteresting*）时代”、即和平与安宁，才能让普通人感到幸福——然而显然，中国从来没有类似的诅咒。网传是译自冯梦龙《醒世恒言》的“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译注

西方的许多左派人士痴迷于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一个大的变化，即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变到一个奇怪的后资本主义，一些分析师称之为“企业新封建主义”。当由于“一般智力”（社会知识和合作）在财富创造中的关键作用，财富的形式与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越来越不相称时，其结果不是像马克思所预期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自我解体，而是由剥削劳动产生的利润逐渐转变为由“一般智力”和其他公共资源私有化所占有的地租。让我们以比尔·盖茨为例：他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的？他的财富与微软所销售的产品生产成本无关（人们甚至可以说，微软支付给其知识工作者的工资相对较高），也就是说，盖茨的财富不是他成功地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生产出好的软件的结果，也不是对其雇佣的知识工作者更高的剥削。那么，为什么数百万人仍在购买微软？因为微软把自己强加为一个几乎普遍的标准，（几乎）垄断了这个领域，是一种“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杰夫·贝索斯和亚马逊、苹果、Facebook 等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公地本身——平台（我们社会交流和互动的空间）——被私有化，这使我们、他们的用户，处于向作为我们封建主的公地所有者支付地租的农奴地位。关于 Facebook，“由于马克·扎克伯格在 Facebook 高层不可动摇的地位，他‘单方面控制了 30 亿人’，举报人 Frances Haugen 告诉英国议员，她呼吁进行紧急外部监管以控制该科技公司的管理并减少对社会的伤害。”¹现代性的巨大成就，即公共空间，就这样消失了。

但是，使情况真正危险，把我们推入新的野蛮状态的是，这些全球私有化的公地与新一波强烈的民族国家竞争并存，这直接违背了建立与我们的环境相关的新模式的迫切需要，这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变化被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称为“野生动物文化的驯化”。到目前为止，每种文化都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约束/教育，并保证他们之间的公民和平，但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潜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每个和平时代都只不过是暂时的停战。一个国家的全部伦理在最高的英雄主义行为中达到顶峰，即准备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野蛮人关系成为国家内部伦理生活的基础。

今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正在进行的公地私有化非但没有使文化（之间的关系）文明化，反而破坏了每一种文化中的伦理实质，把我们推回了野蛮状态。然而，当我们完全接受我们生活在地球飞船上的事实时，迫切要求的任务是在所有人类社区之间实行普遍的团结与合作。没有更高的历史必要性将我们推向这个方向，历史不在我们这边，它倾向于我们的集体自杀。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写的那样，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列车，而是在我们都在后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下完蛋之前完成紧急突破。最近几个月，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与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气候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方式往往令人震惊，这一点越来越明显。这场大流行病必须与全球变暖、爆发的阶级对立、父权制和厌女症以及其他许多正在发生的危机一起处理，这些危机与

它产生共鸣，并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相互联系。这种相互作用是无法控制的，充满了危险，我们不能指望天堂里的任何保证来让解决方案清晰地成为可能。这样一个危险的情况使我们的时刻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时刻：情况显然不是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必须行动。

我认为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最近中国反对大公司的运动和在北京开设专门促进小公司的新证券交易所，也可以看作是反对新封建公司主义的举措，即试图使“正常”资本主义回归。这种情况的讽刺性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一个强大的共产主义政权来保持资本主义的活力，以抵御新封建公司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威胁……因此，我非常感兴趣地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思想家、现任党的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王沪宁的文章。王沪宁正确地强调了文化在符号虚构中的重要作用。反对“现实的虚构性”（“我们所感知的现实是否只是虚构？”）这一话题的真正的唯物主义方式不是严格地区分虚构和现实，而是关注虚构的现实性（*reality of fictions*）。虚构并不在现实之外，它们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互动中，在我们的制度和习俗中被具体化了——正如我们在今天的混乱中所看到的：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的社会互动所基于的虚构，那么我们的社会现实本身就开始崩溃了。

王沪宁称自己为新保守主义者（*neo-conservative*）——这意味着什么？如果相信我们的官媒，那么王沪宁是最近中国政治新动向的反对者。当我读到中国政府下令禁止“996”时，我必须承认我的第一个联想是性方面的。在我们的俚语中，“69”指的是男性对女性进行舔阴、同时女性对男性进行口交的姿势。而我认为“996”指的是一些在中国流行的更倒错的性行为，涉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虽然还缺一个女人）。然后我才了解到，“996”指的是中国许多公司强制的残酷工作节奏（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9点，一周6天）。但在某种意义上，我并没有完全错：中国正在进行的运动有双重目标：更多的经济平等，包括更好的工作条件，同时消除西方流行文化中的性、消费主义和饭圈要素。

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何谓新保守主义者？2019年10月中旬，中国媒体发起攻势，宣传“欧洲和南美的示威活动是西方纵容乱港行径的直接结果”。中国前外交官王震在《新京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混乱的香港’的灾难性影响已经开始影响西方世界。”也就是说，智利和西班牙的示威者正在从香港获得启示。按照同样的思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指责香港示威者“向世界输出革命”。“西方正在为支持香港的暴乱付出代价，它迅速点燃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暴力，预示着西方无法控制的政治风险。……西方有很多问题，有各种不满的暗流。其中许多问题最终会以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一般的方式表现出来”。还有不祥的结论。“加泰罗尼亚可能只是一个开始。”²

3

虽然巴塞罗那和智利的游行示威并非真的师从香港，但这些示威爆发出的普遍不满情绪显然蛰伏已久，只不过是等一个导火索而已。因此，即使特定的法律或措施被废除，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共产中国谨慎地利用全世界当权者对

反叛民众的团结，警告西方不要低估他们自己国家的不满情绪（就算再怎么有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冲突，他们都有相同的基本利益，那就是保住鸟位）但这种防御有用吗？

在对东欧共产主义垮台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于尔根·哈贝马斯其实是位究极左翼福山主义者，他默默地接受了：现有的自由民主秩序是可能的最佳秩序，虽然我们应该努力使它更加公正，但我们不应该挑战它的基本前提。这就是为什么他恰恰赞同许多左派人士所指称的“东欧反共抗议活动的最大缺陷”：这些抗议活动不是由任何对后共产主义未来的新愿景所激发的。正如他所说，中欧和东欧的革命只是“纠正”或“追赶”（*nachholende*）的革命，其目的是使这些社会获得西欧人已经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回到西欧的正常状态。

然而，法国的“黄背心”（*gilets jaunes*）、西班牙的抗议活动以及今天其他类似的抗议活动绝对不是追赶运动。他们体现了人们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深刻不满，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的深刻不满。然而，新的是，民粹主义的右派已经证明比左派更善于引导这些爆发的方向。因此，阿兰·巴迪欧完全有理由对青年党说“*Tout ce qui bouge n'est pas rouge*”——所有移动（制造骚乱）的东西都不是红色的。今天的民粹主义右派参与了以左派为主的民众抗议活动的悠久传统。中国似乎在这里选择了新保守主义的一面：用一个强调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强大民族国家来控制现代全球经济的潜在破坏性动力。这种做法的极限在哪里？

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曾提出，对国家的羞愧，而不是对国家的热爱，可能才是归属感的真正形式。^①这种羞耻感的最好例子发生在 2014 年，当时数百名大屠杀幸存者和幸存者的后代在周六的《纽约时报》上买了广告位，谴责所谓的“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以及对曾经巴勒斯坦地区的持续占领和殖民化”。他们声明：“我们对以色列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极端的、种族主义的非人化（*dehumanization*）感到震惊，这种情况在如今登峰造极。”也许，如果一些以色列人鼓起勇气，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对以色列本身感到羞耻——当然，不是对作为犹太人感到羞耻，而是相反，是犹太教本身最宝贵的遗产正在蒙羞。“无论我的国家是对是错”是最令人厌恶的格言之一，它完美地说明了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只有公共地使用理性的空间里，我们才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康德在他《什么是启蒙》的著名段落中，将理性的“公共”与“私人”使用对立起来：“私人”不是指（相对于公共关系的）私密空间，而是指个人认同于特定的共同体—体制；而“公共”乃是理性超越国界的普遍性：^②

^① “我向你保证，即使是在荷兰，即便一个人完全没有对国家（*national*）的自豪，但也会有一种对国家的羞愧。最无足轻重的荷兰人仍然是一位公民，而最伟大的德国人却不是。……

“尽管是一个相反的启发，这仍是一个启发。……羞愧是一种向内转的愤怒。而如果举国都感到羞耻，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像一头蹲在地上亟于一跃的狮子。我必须承认，在德国，甚至这种羞愧都不曾产生；相反，这些可悲的人们仍然是爱国者。”

见，1843 年 3 月马克思在前往荷兰的内河客船上致卢格的信。——译注

^② 见，康德：《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译注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³

4

这就是为什么康德的启蒙公式并非“不要服从，自由思考！”，也不是“不要服从，自由地思考和反叛！”，而是“自由思考，公开陈述你的想法，但是你要服从！”这对疫苗怀疑者也是如此：你可以自由辩论，发表你的疑问，但一旦公共当局发布规定，你就得遵守。如果没有这种切实可行的共识，我们将慢慢陷入一个由部落派别组成的社会，正如许多西方国家那儿正在发生的那样。但是，如果没有公共使用理性的空间，国家本身就会又一次成为私人理性的傀儡。公众使用理性的空间并不和西方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主相等同——在他最后一个活跃的年份，列宁本人看到了体现公众使用理性的这样一个机构的必要性。在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独裁性质的同时，他提议建立一个中央控制委员会：一个独立的、具有“非政治性”的教育和控制机构，它由最好的教师和技术专家组成，用以监督“政治化”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在“梦想”（列宁的表达方式）关于这个中央控制委员要做的工作时，他描述了这个机构应该如何诉诸“一些半幽默的技巧、鸡贼的装置、诡计或类似的东西。我知道，在西欧那些呆板而严肃的国家，这样的想法会让人们感到恐惧，甚至没有一个正派的官员会考虑这个问题。然而，我希望咱们还没有变得像他们一样官僚主义，在咱们中间，对这一想法的讨论只是给大家提供乐子罢了。的确，为什么不把快乐与实用结合起来？为什么不采用一些幽默或半幽默的伎俩来揭露一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的东西？”⁴

也许，中国也需要一个类似的中央控制委员会。它的首要任务将是注意到毛主义的永久自我革命、反对国家结构僵化的永久斗争和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之间深刻的结构同源性。我想，王沪宁默默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很想在这里套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双关语：“与开银行相比，抢银行算得了什么？”：与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生命形式的永久解体相比，陷入文革的红卫兵的暴力和破坏性暴动又算得了什么？今天，“大跃进”的悲剧正在重演，转生为资本主义大跃进跑步进入现代化的喜剧，“小高炉进村”的老口号转生为“摩天大楼进街道”。

一些憨憨的左派人士声称，正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遗产抵抗着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力量，防止了最严重的过度行为，保持了最低限度的社会团结。然而，如果情况恰恰相反呢？如果说，在一种无意的、为此而更显残酷讽刺的方式之中，文化大革命将其对过去传统的残酷抹杀作为一种冲击，为随后的资本主义繁荣创造了条件，那又如何呢？如果中国不得加入纳奥米·克

莱因 (Naomi Klein) 的国家名单，在这些国家中，自然、军事或社会灾难为新的资本主义爆炸扫清了障碍，那又如何呢？

因此，历史的最高讽刺是，正是毛本人通过撕毁传统社会的结构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意识形态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人民，特别是年轻人的呼吁是什么？不要等着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你有权利反叛！所以，你们要自己思考和行动，破坏文物，不仅要谴责和攻击你们的长辈，还要谴责和攻击政府和党的官员！扫除压迫性的国家机制，并在公社中组织自己的力量！而毛泽东的号召被听到了——随之而来的是无拘无束的激情爆发，将所有形式的权威去合法化，以至于最后，军队不得不介入以恢复秩序。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正在崛起，与此同时，愤世嫉俗的不信也在崛起。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退一步，不要只分析今天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而应该关注它们更多的形式特征。当我们说我们相信或不相信一种意识形态时，我们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即使没有人真正相信，有些信仰也在社会上发挥着作用。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不被国家官员认真对待——以这种方式，它完美地发挥了作用。当有人把官方意识形态看得太重时，官僚们就会陷入恐慌——对他们来说，这是成为异见者的第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只是不信——他们表现得好像他们相信一样，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的信仰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之中。

尼尔斯·玻尔为信仰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看到他门上的马蹄铁，一位惊讶的访客说他不相信马蹄铁能带来好运的迷信，玻尔对此进行了反驳：“我也不相信它；我把它放在那里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就算一个人不相信它，它也是有效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某种意识形态被强制执行时，人们总是应该仔细分析这种强制执行的实际效果。我年轻时，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教育事实上惨遭失败：大多数学生只是无视它，他们的反应是：“不要把它当回事，只要享受你的生活。”然而，一位老共产党员向我解释说，这种表面上的失败其实是一种成功：当权者希望民众无视官方意识形态，只是机械地参加官方仪式。因此，当我听说，今天在中国，学生们又被告知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我的问题是：这个禁令到底是什么意思？

意识形态的空间与规范我们日常互动的习俗，是模糊和不一致的。有些禁令我们应该违反，但要谨慎地、不在公开场合违反。而反过来说，我们被给与某些自由，条件是我们不使用它们——如果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能获得自由选择。(例如，在我的国家，如果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吃饭，而他是穷人，当账单到达时，他应该坚持要AA，但这时我应该坚持我买单，他也会很快接受)我们的禁令本身就是被禁止的，也就是说，不能公开宣布。例如，在梆梆硬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当然禁止公开批评领袖，但也禁止公开宣布这一禁令。没有人公开说禁止批评斯大林，公开说这话的人会立刻消失。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关于中国的情况：这种明确和不成文的规则的复杂结构在那里是如何运作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说了什么中隐含着没说什么之间的

复杂的相互作用，让我来看看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ch）的电影《妮诺契卡》（Ninotchka）中一个关于辩证法的精彩笑话⁵：主人公去了一家咖啡馆，点了没有奶油的咖啡；服务员回答道，“对不起，我们的奶油已经用完了，但我们还有牛奶。我可以给你带来没有牛奶的咖啡吗？”在这两种情况下，顾客得到的都是咖啡，但这“一杯咖啡”每次都伴随着不同的否定词，先是咖啡—不加奶油，然后是咖啡—不加牛奶。这些台词在政治上有一个对应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波兰的一个著名笑话中，一位顾客进入一家商店，问道：“你们有黄油吗？”顾客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们是没有卫生纸的商店；街对面的商店是没有黄油的商店！”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决定性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与抽象的否定相对：普通咖啡、不加牛奶的咖啡与不加奶油的咖啡在现实中是同一种咖啡，但在我们的符号世界中，它们是不同的，它们体现了不同形式的否定（或没有否定）。而政治也是如此吗？当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或群体体验到其社会地位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身份、而是一种“决定性否定”时，情况就会被政治化。当一个女人体验到她的地位是“没有”（没有自由、没有经济权力等等）时，她就成为了女性主义者。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现实，但我们可以也应该让它出现被它所否定的污名。当一个女人在父权制社会中体验到她的身份以“没有”为标志后，所有的过去都被改变了：我们学会在以前体验到的有机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发现压迫和剥削的痕迹。这种确定否定的逻辑意味着意义的回溯，伟大的英国保守派诗人 T·S·艾略特很好地表述了这一点：

“当一件新的艺术作品被创造出来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在它之前的所有艺术作品上。现有的纪念物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理想秩序，这种秩序由于新的（现实中的）艺术作品在它们之间的引入而被修改。在新作品到来之前，现有的秩序是完整的；为了在新事物的监督下保持秩序，整个现有的秩序必须被改变，即使是轻微的改变；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整体的关系、比例、价值都被重新调整；这就是新旧之间的一致性。……过去应该被现在所改变，就像现在被过去所引导一样。”⁶

让我们以莎士比亚为例：今天对《哈姆雷特》的伟大上演不仅仅是对该剧的新的诠释，它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莎士比亚原作本身的不足——在写作时，莎士比亚并不完全知道他在说什么，该剧充满了不一致，面向未来。而政治也是如此。1953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日内瓦参加结束朝鲜战争的和平谈判时，一位法国记者问他对法国大革命有何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说这些还为时过早”。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对的：随着90年代末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解体，争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的斗争再次爆发了。自由主义修正主义者试图强加这样的概念：1989年共产主义的消亡恰好发生在正确的时刻：它标志着始于1789年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由雅各宾派首次登上舞台以来的革命模式的最终失败。过去的战斗今天仍在继续：如果一个激进解放政治的新空间将出现，那么法国大革命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僵局。

——法国大革命的例子使我们向哲学靠拢。为了命名这种复杂的对立面的相互作用，黑格尔使用了一个独特的术语“绝对反冲”（“absoluter Gegenstoss”，或者更简单来说，就是反推）：一个撤回动作创造了它所撤回的东西；在运动中对立面的推理性重合，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事物从它自己的损失中出现了。

“因此，反思在它面前发现了一个它所超越的直接的东西，并且它是从那里返回的。但这种回归只是反思在它面前发现的东西的预设。因此，被发现的东西只有通过被抛在后面才会出现……反思的运动应被视为对自身的绝对反冲。因为回到自身的预设只存在于回归本身之中，而本质只能来自于此，并作为这种回归而存在。”⁷

因此，绝对反冲代表了对立面的根本重合，在其中，行动作为它自己的反行动出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其中，极其消极的行动（损失、撤回）产生了它“否定”的东西。“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只有通过受到抛弃才会出现”及其反面（“只有在回归行动之中”，我们所要回归之处才得以出现，例如那些通过“追根寻族”而构成自己的民族）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反思”的两个面相：一种不再外在于其对象、将其作为既定前提的反思，而是一种闭合回路并设置自身前提的反思。

以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为例，首先是前殖民时代的印度的“无区分的多元性”；然后是英国殖民的残酷介入，将殖民世界的结构强加给印度，并将西方的普遍主义用于辩护殖民行为；随后是印度对殖民的抵抗，指出西方在殖民印度的过程中背叛了自己的平等主义解放遗产。此时，反殖民斗争指向了建立世俗民主印度国家的理想；虽然这个理想来自于西方，但是其的印度版本不是西方世俗—平等主义精神和印度传统之间的“综合”，而是通过切断它在西方传统中的根基并肯定其实际的普遍性来充分肯定西方平等主义精神。

在遗失某物的经验之前，不存在任何东西——当然在失去之前还是有一些东西（对印度来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传统），但这个传统是一个异质性的混沌，与后来的民族复兴想要回归的东西毫无关系。这对所有失去和重获民族身份的过程都是适用的。在其复兴的过程中，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将其目前的结构体验为失去了一些珍贵的起源，并努力重新获得这些起源，期望回到起源之中——然而，这种遗失的起源并不存在，它是通过其遗失和回归它们的经验而构成的。这适用于所有的“回归起源”：当从 19 世纪开始，新的民族国家在中欧和东欧不断涌现时，他们对“旧的民族根源”的回归产生了这些根源，产生了埃里克·霍布斯鲍恩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⁸。

这样一种追溯性的运动并非只能发生在文化和象征空间中，难道我们的物理现实不也是如此吗？在此，我需要讨论量子物理学。根据这一学科的理论，要如何解释禁止我们在量子水平上获得对粒子的全部知识（以确定粒子的速度和位置）的所谓“不确定性原理”？对爱因斯坦来说，这个不确定性原理证明了量子物理学并没有提供对现实的完整描述，一定有一些未知的特征被其概念装置所遗漏。相反，海森堡与玻尔等人坚持认为，我们对量子现实知识的不完

备性指向量子现实本身的诡异不完备性，而这种说法最早导致了一种惊人的本体论观点。当我们想在一个人工（虚拟、数字）媒介中模拟现实时，我们不必做到尽善尽美，而只需重现图像中能够为观众的视点带来现实感的特征。比方说，如果背景中有一栋房子，我们不必通过程序构建房子的整个内部，因为我们预计玩家不会想进入房子；或者，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一个虚拟人仅限于设置他的外表，而不需要操心内部器官、骨骼之类的东西。我们只需要附加一个程序，能够在玩家互动需要时（比如说，如果他要刀子深入虚拟人的身体）及时填补这个空白即可。当我们模拟一个虚拟宇宙时，物体的微观结构可以是空白的，地平线上的星星也可以看起来差不多就得了，因为没有人会闲的凑近了观赏。真正有趣的是，我们完全可以用类似的想法解读探究宇宙中最微小的组成部分时遇到的量子不确定性，将其视作我们所处模拟世界只具有有限分辨率的特征，即当做（我们所能体验到的）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备性的标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位上帝正在为我们这些人类居民创造世界，好让我们能够居住其中，而他的任务是

“可以通过仅为其居民提供他们有必要了解内容来简化工作。例如，地球内部的微观结构可以是空白的，至少在有人决定深入挖掘之前可以就这么摸了，哪怕有人真要一探究竟，细节可以根据需要赶工填上。最遥远的恒星做成渣清就行，没有人会靠近它们来注意到不对劲的地方。”⁹

这个想法的意思就是说，创造，或者说“编程”我们的宇宙的上帝摸得透彻（或者说，他低估了人类智慧）：他认为我们人类不会成功地探究超过原子水平的自然结构，所以他只给我们的宇宙编程到了原子结构水平——更微观的构造都是糊弄了事，就像PC游戏中不会给房子内部编程一样。然而，我们只能通过神学—数字方式解读这一悖论吗？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模拟的宇宙中，也可以解读为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整的信号。在第一种情况下，本体论的不完全性被转换为认识论的不完全性，也就是说，不完备性被视为另一个（秘密的，但完全实在的）机构构建模拟的宇宙所留下的影响。真正困难的是接受第二个选择，即现实本身的本体论不完整性。也就是说，马上就会的是一个巨大的常识性责难：这种本体论的不完备性对现实本身又何以能够成立？难道现实不是由其本体论的完备性来定义的吗？如果现实“真的存在于那里”，它就必须“一直”是完整的，否则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悬在空中”的虚构，就像非实质性东西的表象……但量子物理学的本体论含义似乎是，物质现实本身已经是不完整的，向未来开放。

——T·S·艾略特在他的《对文化定义的笔记》中说，当保持一个宗教的唯一方法是在它的尸体上进行宗派分裂的时候，唯一的选择是在异端和非信仰之间进行。列宁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以他自己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今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番外：原定于周六进行辩论的广告

今天，我们有两种哲学的终结。第一种发生在积极的科学中，慢慢地占据了旧的形而上学猜测的领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实验物理学的技术进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经典的科学世界里是无法想象的，那就是“实验形而上学”。

“从前认为只属于哲学辩论的问题已经被带入了经验调查的轨道”。¹⁰所检验的适当的“形而上学”命题是偶然性的本体论地位、因果性的定位条件、独立于我们观察的现实的地位，等等。这就是为什么霍金在他的《大设计》一开始就胜利地宣称“哲学已死”¹¹。随着量子物理学和宇宙学的最新进展，所谓的实验形而上学达到了顶点：关于宇宙起源等的形而上学问题等等这些直到现在还是哲学推测的话题，现在可以通过实验科学来回答，从而得到经验的检验……

“大脑升级”的前景是人类思维自然化的一种最终点：当我们的思维过程可以直接与数字机器互动，它实际上成为现实中的一个对象，它不再是与外部现实相对的“我们”的内在思维。

另一方面，在今天的超验历史主义下，关于现实的“天真”问题恰恰被接受为“天真”，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提供我们知识的最终认知框架。例如，福柯的真理概念可以概括为：真理/非真理不是我们陈述的直接属性，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话语产生各自特定的真理效应，也就是说，它意味着它自己关于什么是“真”的价值标准。

“问题不在于在话语中属于科学性或真理范畴的东西与属于其他范畴的东西之间划清界限，而在于历史地看到真理的效果是如何在既非真实也非虚假的话语中产生的。”¹²

科学用自己的术语来定义真理：一个命题的真理（应该用清晰明确的、最好是形式化的术语来表述）是由任何人都可以重复的实验程序来确立的。宗教话语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它的“真理”是通过复杂的修辞方式确立的，这些修辞方式产生了一种居住在某个由更高的权力控制的有意义的世界中的经验。因此，如果有人问佻柯一个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比如“我们有自由意志吗？”，他的回答会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只具有意义，它只能在某种认识论、知识/权力领域内提出，这种认识论决定了它在什么条件下是真的或假的，而我们最终能做的就是描述这种认识论。”对于福柯来说，这种认识论在德语中被称为 *Unhintergehbare*，即我们无法触及的背后的东西。是否有办法摆脱这种令人衰弱的僵局？

¹ Facebook whistleblower Frances Haugen calls for urgent external regulation | Facebook | The Guardian. See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1/oct/25/facebook-whistleblower-frances-haugen-calls-for-urgent-external-regulation>

² Quoted from <https://edition.cnn.com/2019/10/21/asia/china-hong-kong-chile-spain-protests-intl-hnk/index.html>.

³ Immanuel Kan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Isaac Kramnick, *The Portable Enlightenment Read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5, p. 5.

⁴ V.I. Lenin, “Better Few, But Better” (1923), quoted from Better Fewer, But Better (marxists.org).

⁵ 这里我欠阿伦卡·祖潘卡奇 (Alenka Zupancic) 一个注释。

⁶ T.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 (1922).

⁷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69, p. 402.

⁸ See Eric Hobsbawn and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⁹ See Nicholas Fearn, *Philosophy. The Latest Answers To the Oldest Questions*,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5, p. 77.

¹⁰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

¹¹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The Grand Design*, New York: Bantam 2010, p. 5.

¹²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 118.